



砖塔胡同仍是人们心目中“老北京”的代表地段。傍晚来临时，胡同中开始进入一天内最后的忙碌阶段：劳作一天的人们开始归来；饭后，人们又会走出家门，在胡同里乘凉聊天。

——自元代就是这个名字 夕阳下的砖塔胡同

倪一灵 文/图

沿着北京西南大街就能寻到砖塔胡同的东口。胡同因青砖古塔而得名。古塔建于元代，是高僧万松老人的墓塔。作为自元代就有的胡同名，砖塔胡同入选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首批583处传统地名保护名录。

8月晴日的傍晚，夕阳温柔地洒下来，像是给胡同刷了一道金色的新漆。人们走过，拉出长长的影子。

砖塔胡同居民肖大爷热情地做起了导游，砖塔胡同背后的故事也就此徐徐展开：鲁迅、张恨水都曾在这里居住，胡同里那并不起眼的灰墙背后就是他们的故居；曾被用作民宅的关帝庙现已腾退完毕，已有计划重新修整。

一路上，肖大爷忙着跟街坊邻居打招呼，不用称呼姓名，一声“哎”就能自然引出许多寒暄，哪位邻居又出了远门，谁家孩子又快开学了……些许生活小事都能攀谈许久。

肖大爷还带我去看了他居住的小院。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开得十分繁茂。肖大爷特意在狭长的走廊挂上了五颜六色的彩灯，小院一下子就平添了许多喜庆。

肖大爷从小在这里长大，现在他和发小们也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他说，未来会有更多年轻人来到砖塔胡同生活，这会给这条历史悠久的胡同注入更多活力。肖大爷说：“还是不能丢了人气儿。”

北京583处传统地名列入保护名录

本报电 北京开始大规模保护传统地名。8月23日起，《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第一批）》在多个政府网站进行为期30天的公示。经过前期资料收集、价值评估、街道和责任规划师审核、专家论证等工作，583处传统地名列入了首批保护名录。

这583处传统地名大多数位于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从地名产生时期看，元代2处，明代153处，清代379处，民国47处，当代2处。它们是北京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

进入保护名录的传统地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

北京市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和宣传工作，纳入了《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及《2021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2021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会同东城区人民政府、西城区人民政府开展了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编制工作。为提高保护名录的权威性、准确性，编制团队参考大量明清史料、地图

等资料，对老城地名使用时间、得名由来、历史演变进行了精心考证，还原了老城街巷真实历史沿革，深入挖掘了老城地名的历史文化底蕴。

目前，已确认砖塔胡同、史家胡同的名称始自元代。另有629处明代地名可确定位置。清代仅通过对《乾隆京城全图》的梳理，就得到乾隆年间街巷胡同地名数量1322处，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地名2046处。其中不少地名出现时间被提前，如著名的杨梅竹斜街，此前被认为是清末地名。此次编制过程中

发现纪晓岚乾隆年间《阅微草堂笔记》中已有“杨梅竹斜街”记载，从而将这一著名街巷的历史提前到了清代中前期。

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根据研究成果发现，大量现在还在使用的以城门命名的道路，如崇文门内、外大街、宣武门内、外大街，德胜门内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等命名也可追溯到乾隆年间，而非20世纪60年代的修改与规范。

据新京报报道，随着第一批名录公布，北京市将逐步建立地名文化遗产定期评估机制。（徐美慧）

大运河真是太大了！时至今日，仍会有许多人难以清晰、准确地描述大运河和大运河文化遗产。在一些城市，运河遗迹化为早已失去实用功能的河道、码头、闸坝散落分布，人们与它们擦肩而过却常常视而不见；与此同时，各地运河两岸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河道环境整治、通航恢复、休闲公园和生态步道建设方兴未艾……此时，应该如何去理解大运河文化遗产、又应该如何去阐释它？我前往淮安，期待这座“运河之都”能够给我答案。

同时，各地运河两岸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河道环境整治、通航恢复、休闲公园和生态步道建设方兴未艾……此时，应该如何去理解大运河文化遗产、又应该如何去阐释它？我前往淮安，期待这座“运河之都”能够给我答案。



淮安大运河文化遗址已经引入统一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标识系统。

重新认识运河遗产的作用：沟通过去，连接今天

历史上，可能没有哪座城市像淮安一样如此长久密切地与大运河绑定在一起，相互影响又相互成就。淮安维系了运河的运转，也享受着运河带来的财富和文化；运河的走向与畅通，也深刻影响着淮安城市的面貌和发展。

淮安非常适合去体会大运河的价值和遗产地精神。带着“朝圣”的心态，我来到淮安清口枢纽，它是由一系列河道、闸坝、堤防等工程共同组成的大型水利枢纽，分别承担疏浚、维护和水文观测功能，体现了农业文明时期东方水利、水运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堪称大型露天水利博物馆。清同治年间，黄河结束夺淮入海历史，改道山东入海。清口原有的“蓄清、刷黄、济运”功能随之消失，逐渐湮没。

御制重修惠济祠碑和码头天妃坝石工遗址是淮安大运河遗产的代表性遗存。坝址已经考古发掘。这是洪泽湖大堤的延伸部分，过去用来抵挡洪水，如今则承担相应的遗产展示功能。御制碑记载了当时国家对于治理河漕的重视。二者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重要构成部分。

位于市区的清江闸则呈现出非常繁华的景象：醒目的标识碑和导览牌提示人们这里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河面上停泊着几艘游船；若桥上身着汉服的青年人在嬉笑拍照；河堤上，老人在悠闲地漫步……给人的感受是：这里的运河是“活的”。淮安赋予大运河以人气和活力，大运河仍在影响和塑造着淮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经2500多年的持续开凿、疏浚和使用，大运河成为了镌刻在大地上的可见性极强的地标。这种“可见性”在各地人们的意识中得到刻意凸显，进而成为公共标识标记。以淮安为代表，运河畔所有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开始使用相同的标识，它是由汉字“运河”组成的水纹，水纹首尾连接，连续不断，象征大运河延伸不断地从历史中缓缓流向未来。

淮安“运河之都”形象：兼容并包，攻坚克难

大运河文化遗产不再只是单纯的古代水利标本，而是有着勾连古今的纽带作用。这种古今呼应的动态过程对于阐释遗产价值、标识归纳遗产地精神非常重要。淮安一向以“运河之都”形象示人，现在，它还是江苏省率先导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标识形象识别系统工程的城市。

淮安正在迎来新的机遇：大运河文化遗产对于中国人而言，更多化为鲜活的社会生活和认知，它仍然出现在沿线百姓生活的角落和瞬间。我相信，一座运河遗产城市真正的精神特质，一定藏在普通百姓日常的一粥一饭、一言一行中。

淮安人的饮食文化中，非常擅长做面。人们来看运河，多要特意尝一尝长鱼面。淮安的长鱼面堪称南北融合佳品：汤底是精华，要用数十种香料和药材慢慢熬就。汤底讲究精致，于是黄鳝要仔细洗净去骨，然后再配上北方那种宽厚劲道的面条和各类菜码，一碗既不同于江南、又比北方口味精细的长鱼面就出锅了。吃着香喷喷的长鱼面，你会认同本地人对淮安民风的的评价：“得燥湿之宜，具南北之美；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就是说，淮安居南北风气之中，各选其优而左右逢源。如今在清江闸还能见到一面照壁，上书“南船北马舍舟登岸”。这种兼容并包的态度，恰准确地描述了大运河上核心功能与景观，也很好诠释了这座兼做运河城市和遗产城市的精神性格。

吃罢长鱼面，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看出我对大运河格外感兴趣，便向我推荐了苏北灌溉总渠上的“水上立交”——这是他心目中的当代淮安水运代表作。京杭大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在这里纵横交汇。历史上有超过800年的时光中，淮安都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叉节点位置，于是这里的水工措施不仅体现了人类与大自然相互适应的智慧，还体现了人们越挫越勇的意志和攻坚克难的协同意识。进入21世纪之后，在当代治理淮河的过程中，淮安也多次处理水患。面对损失，当地农民给出的回答却是：“我们的损失是小事，淮河抗洪是天大的事。国家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事实上，从清口枢纽到水上立交，从遗产遗址到当今科技工程，延续不变的是从“治河必先治淮”到“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传承。正是这种攻坚克难的性格成就了淮安有别于其他运河城市的精神特质。

如果重新梳理淮安的“运河之都”形象，我会给它体现出的人类共存的“兼容并包”和“攻坚克难”都投上一票。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链接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加强主题展示功能，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提升传统利用水平，推进实施重点工程，着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据新华社）

——自元代就是这个名字 清晨的史家胡同

高廷秋 文/图

“一条胡同，半个近代中国史。”长约700多米的史家胡同，从来都充盈着历史的故事。进入8月底的初秋，清晨空气中开始夹杂着丝丝凉爽，刺眼的阳光在胡同里幻化成斑驳的光影，骑行在此，许多人都会放慢脚步，体会这种悠闲的惬意。

现在，史家胡同仍然是感受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好地方。生活在胡同里的老人，慢悠悠地出门买菜买早点，不时有拎着糖油饼拖着买菜小车的居民穿行而过。本地居民对胡同的历史感到骄傲——自

元代以来，史家胡同不曾更改过名姓。从清代到新中国成立，这条胡同是入住过中国知识界名人最多的地方之一。

如果你路过史家胡同，不妨去史家胡同博物馆看看。近代历史上这里吸引诸多文人墨客；现如今这有北京首家胡同博物馆，这里不但有130个微缩复原院落沙盘，还能听到“虎撵子”“震惊闻”等70多种胡同声音，带你重温老北京胡同回忆。

作家老舍说，北平之秋就是人间天堂。史家胡同是最好的例证。



夏秋之交的清晨，人们走出家门，在史家胡同阳光与绿荫构成的斑驳光影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山西发现中国最早木炭窑

本报电 填补中国冶金考古空白的山西绛县西吴遗址有了新发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在遗址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发现的一处特殊遗迹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木炭窑，为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木炭窑。

自2018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西吴遗址开展连续考古工作，确认该遗址是一处夏商时期生产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遗址。当地考古人员在遗址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东区发掘时，发现一处特殊遗迹，后通过精细化发掘，对其进行完整揭露。为搞清其性质，考古人员结合考古背景，从民间材料寻找线索，并通过实验考古予以验证，最终判定该特殊遗迹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木炭窑。

考古及文献资料表明，木炭在先秦时期广泛用于取暖、冶金、防潮等领域，所用数量非常巨大，但以往从未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夏商时期生产木炭的场所。

研究人员认为，西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木炭窑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木炭窑遗迹，该遗迹的发现为研究早期生产、利用木炭及早期木炭质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为复原冶铜生产工作链、厘清冶铜作坊布局增加了新材料。（胡键）

广东丹霞山发现竹类新种小麻竹

本报电 据韶关市丹霞山管理委员会介绍，在位于广东的丹霞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竹类专家夏念和教授团队发现了竹类新种——小麻竹。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丹霞山的竹类植物非常丰富，但系统性的调查研究尚未完成。多年来，夏念和团队一直坚持在丹霞山区域开展竹类调查。

2020年9月，夏念和团队在丹霞山的车湾村和上廖村发现了一种未知的竹类植物。经过仔细的本标检查之后，团队成员发现该种与近似种粉麻竹和麻竹均不同，确为一个未被描述过的新种。因此，团队成员根据当地的叫法将其命名为小麻竹。

截至目前，夏念和团队已调查到竹类植物8属33种，团队成员常常需要深入丹霞山的无人区、攀悬崖绝壁，走潮湿沟谷，更需要在不同时期采集根茎、枝叶、竹笋、秆箨、竹花及竹果等部位，如此制作的标本才能准确鉴定物种。

目前，竹类调查项目仍在进行中，该项研究对深入了解丹霞山的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王坚 陈再雄）



今年4月下旬，藏羚羊已经开始向可可西里卓乃湖方向行进。新华社记者 吴刚摄

可可西里藏羚羊迁徙产仔季收官

记录回迁藏羚羊6185只

本报电 据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日前公布的数据，今年“高原精灵”藏羚羊的迁徙产仔季已结束。工作人员共记录到3874只藏羚羊进入到可可西里产仔，而回迁藏羚羊的数量达到6185只。

据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此前监测显示，5月2日13时，今年首批235只藏羚羊穿过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前往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产仔，标志着2021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这是被誉为全球最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

今年，产仔结束的藏羚羊从7月16日开始回迁至原栖息地，至8月16

日结束。

可可西里的蒙古语意为“美丽的少女”，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气候恶劣，是著名的无人区和世界自然遗产。20世纪90年代，可可西里地区频繁发生盗猎藏羚羊和反盗猎事件，成为当时世界舆论焦点。

目前，我国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到30万头以上。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专家连新明此前表示，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中，藏羚羊跨越“易危”，从“濒危”直接降为“近危”，说明种群数量在上升，未来还会持续上升，“这是人类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最成功案例之一”。（张添福）